



盧建榮主編

歷史與文化叢書 1

歷史的再思考

著 / 凱斯·詹京斯 (Keith Jenkins)

譯 / 賈士衡

麥田出版



盧建榮主編

歷史與文化叢書 1

歷史的再思考

著 / 凱斯·詹京斯 (Keith Jenkins)

譯 / 賈士衡

麥田出版

Re-thinking History
Copyright © 1991 by Keith Jenkins
'In Conversation: Keith Jenkins and Alun Munslow' © 2003 Alun Munslow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6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utledge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歷史與文化叢書 1

歷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History

作 者 凱斯·詹京斯 (Keith Jenkins)
譯 者 賈士衛
主 編 盧建榮
責 任 編 輯 吳莉君 余思
總 經 理 陳蕙慧
發 行 人 涂玉雲
出 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02)2356-0933 傳真：(02)2351-9179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網址：www.cite.com.tw
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 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35 號 3 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 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E-mail: citecite@streamyx.com
印 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 一 刷 1996 年 12 月 1 日
二 版 一 刷 2006 年 8 月 1 日

售價／22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 978-986-7252-40-1

作者簡介

凱斯·詹京斯 (Keith Jenkins)

英國史學家。曾任教於西蘇薩克斯高等教育暨史學方法研究院，現任齊切斯特研究所歷史高級講師，及研究所教育資格檢定 (PGCE) 史學方法導師。致力於後現代主義史學觀念的探討及歷史教育的發展。著有《後現代歷史學——從卡耳和艾爾頓到羅遜與懷特》(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重構歷史——一門舊學科的新思維》(Refiguring History: New Thoughts on an Old Discipline) 等書。

目次

■ 譯者簡介 ■

賈士衡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考古人類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班肄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系博士班肄業。曾服務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文研究所，曾任美國丹佛市美術博物館亞洲部研究員，現從事翻譯工作。

譯有《英國史》、《英國社會史》、《一次大戰的源起》、《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等書。

	修訂版說明
007	中譯本風行十年後修訂版的 劃時代意義 盧建榮
	導讀一
015	十年孤劍滄海盟 盧建榮 ——如何操作後現代歷史學
	導讀二
041	有志者必讀的入門經典 古偉瀛
065	詹京斯訪談錄
073	引言
	第一章
083	歷史是什麼 在理論上／在實踐上／歷史的定義
	第二章
123	論一些問題和答案 論真實／論事實和解釋／論偏見／論神入／ 論資料與證據／論對語：因果關係等等／歷 史學：一門科學或一門藝術／結論
	第三章
177	在後現代世界做歷史
199	索引

修訂版說明

中譯本風行十年後修訂版的劃時代意義

盧建榮

一九九六年，凱斯·詹京斯《歷史的再思考》的中譯本於台灣推出，轉眼十年過去了，作為麥田歷史書系的第一炮，一共印行了九刷，是麥田歷史書類讀者反應最熱烈的一本書。十年來，身為書系主編的我收到不少讀者或以通信、或以口頭的閱讀心得。十年來，我與前總編陳雨航、以及歷任歷史主編，都存心將此一譯本改得盡善盡美，以回饋讀者。現在，英文原版的新版多了作者訪問一文，正是適時推出修訂版的最佳時刻。修訂版的清校稿付排在即，我於閱後不能不有感而發，添綴數語於下以資誌念：

《歷史的再思考》一書是針對西方現代史學的一篇討檄文，推出之後毀譽參半，但十餘年來西方史學界新、舊史學並立的格局益發明顯。中國的新史學運動是移植西方現代史

學於中國的一個學術運動，橘逾淮而為枳，中國新史學運動亦然。中、西史界同樣追求史學現代性，但彼此內涵有別，不可不辨明。在中國，史學的現代性，主要集中在第一、史學終究可以獲知真相，第二、真相建立在史料依時序作先後排比。第一點是意識形態可以不必論，第二點則決定了中國現代史學在編纂的書寫上採用了與敘述史學完全不同調的東西。這是一個與古典史學所講究的藝術性揮別的學術革命舉措！它為求史學學科合法性而倡言向「科學」傾斜所不惜付出的代價。八十幾年過去了，現代的中文史著只能被供奉在學術象牙塔中，而與廣大社會各階層無關。試想一般人中還多多少少會去讀司馬遷的《史記》，但號稱中國現代史學之父的陳寅恪其所著又有多少人會去讀呢？古典史學和現代史學的差異、以及高下就在這個地方見出。但掌握學術霸權的史界師生後援會迄今依然不見及此。十年前我藉由導讀《歷史的再思考》的機會，擬以後學用以衝撞主流學術社群的宰制權威，顯然成效不彰。但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猶有可說者焉。近十年的史學變革固然不在權力版圖的改觀，然則後學的風尚漸起，而與主流學術社群有所區隔，不能不說對既有學術威權體制稍有撼動。

現代史學陣營與後現代史學陣營的對立格局並未形成之前，《歷史的再思考》一書倒是攪擾了主流學術社群所主導

的權力平靜湖面，茲舉犖犖大者如下：首先，學術機構提供舞台讓後學的支持和反對雙方可以對話，在這裡，我們看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主辦一場學術會議，由倡言「攔截後現代」不遺餘力的黃進興所主持，邀來王明珂、盧建榮等人暢論後學的前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所屬文物陳列館在後現代理念支援下，重新裝潢、以及更動展品展示方式，於2002年10月重新開館，由王明珂為文指出一座後現代文物館的誕生。還有，漢學中心所屬機關報《漢學通訊》提供一期專號，由杜維運、盧建榮等人分別執筆，由反對和欣賞的雙方各自表述。其次，教育機構的各大學歷史系紛紛採用《歷史的再思考》做教材，逐漸取代E·卡耳的《歷史論集》。甚至有歷史研究所的入學考試以後現代歷史學入題。第三，有學者以後現代為題寫成一本專書，我指的是由王晴佳和古偉瀛合寫的一本書。第四，新一代的學子中逐漸有人對後學趨之若鶩，以後學申請學術計畫者大有人在。我就審過一件這樣的計畫。我相信同行中亦有人作過類似的審查工作。

詹京斯於《歷史的再思考》所倡議的後現代史學改革方案在台灣落實發展的情形與西方史壇不盡相同。台灣史界對後現代的回應集中在第一、新文化史文本的湧現，第二、司馬遷式敘述史學的振興，以及第三、「再現」(representation)

取代恢復的概念來重建歷史。

先說新文化史文本的湧現。許多學者表現出研究主題轉向文化：熊秉真在明清童年文化的抉隱、發微上令人驚豔（1999）；李孝悌注目於士大夫文人在呈現自我和敘寫他人上獨特的情欲和身體（2001-2005）；張瑞德對兩岸爭奪7月7日和10月25日節日的詮釋權，情有獨鍾，指出節日意涵隨政治而搖擺（1998）；蔣竹山筆觸所及，揭示女性裸體在戰爭中的挪用（1999）；陳熙遠勾勒年假狂歡活動中的各種文化越界之舉（2004）；陳元朋發掘出荔枝的珍貴性是文化建構的結果（2003）；邱仲麟能夠嗅出北京城穢臭的味道是經由明清文人書寫所形成的集體記憶（2004）。從以上可以窺知，新文化史家將人的感官和知解活動列為歷史研究的主題，是所從來沒有過的事。

中文世界史著內容的更新已如上述，更有學者不僅內容變，形式也配合內容以俱變的。新史學運動以來的史家主要是利用有記錄的文獻材料，對於遺跡或遺物的材料往往束手無策。即令有一流史家如嚴耕望也只能將遺跡或遺物當論據使用，而不知用作敘述性材料。盧建榮在處理中古華北社區居民的社會意識課題上，將遺跡材料轉化為史學可究單位的行動。這樣，他就能將各個社區的種種行動加以敘寫，而不是作為論證、論點用時的引證材料（1995）。盧建榮更是台

灣第一位將「文本」、「論述」等新式術語用於他對於台灣魯凱族反水庫運動的史作研究上（1996）。以後盧作用此新式術語可說層出不窮。以上盧建榮不待《歷史的再思考》出版就想讓史著從內容到形式一體更新。

其次，關於敘述史學的振興這一點，民國新史學運動以來最為人詬病的寫作形式就是連篇累牘地大量引證材料，這樣大肆引證材料還美名其說：「合乎科學」。這點跟當代西方史家主要依賴轉述史料作為歷史書寫的不二法門，迥不相同。盧建榮在探究唐玄宗朝的政治與文化的課題上，改而大量使用轉述的敘事技巧，文中直接徵引文獻處極少（1997）。這在兩岸是獨步一時的。論文倘若少徵引文獻易被人質疑難免扭曲文獻的原意。但盧氏的辯解是，有此可能，但不能因噎廢食。利用轉述技巧寫成專書的例子，更是不乏其人，計有彭明輝《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2000）、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2002）、盧建榮《從根爛起》（2003），以及盧建榮《鐵面急先鋒》（2004）等書。

以上不管史家可以將遺跡材料轉化為可以敘寫的行動，以及放棄大量徵引史料辦法改採轉述史料的辦法，正是敘述史學在寫作上賴以生存的兩大秘技。古代的司馬遷和司馬光均深知其事。秘技失落百餘年，如今總算有史家重拾故技，兩司馬於地下有知，當感欣慰才是。台灣史學界開始出現敘

述史學學會，當與此學術思潮有關。該會首任會長為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正珍女士，已在2005年開過一次研討會，今年循例將會一場。

第三，關於運用「再現」觀念在歷史書寫上，這又要提到盧建榮的創新作法。盧建榮在其《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一書中在講到古人臨終場景和臨終遺言這兩種文化現象時，他不像過去史家直接徵引出土墓誌中所載。他認為每場臨終場景、以及每位臨死者的口述遺言，都被誌作者以化約方式載入墓誌。墓誌說法無法等同於真實發生的一段過往，因此他屢屢以誌作者再現歷史的方式來呈現歷史。這是中國現代史學上第一次大規模運用後現代其「再現」理念以入史。

十年前賈士衡女士在譯《歷史的再思考》時，風氣未開，再加上可資憑藉的參考資源不多，情況未若今天修訂版能借助十年來新的學術氣候。這裡面有許多詞語翻譯在當時猶自莫衷一是，像「文類」和「建構」這兩辭，如今許多青年學子多能瑯瑯上口，十年前則不然，這方面的缺失都在這次修訂版予以補救。這是賴時代進步使然。

整體而言，在這次修訂版中，賈女士當年「業績」約莫百分之九十以上被保留下來。從賈女士的無中生有到這次修訂版，我們看到學術累積的不易，十年於茲，所能致力進步

和改善的地方就是這麼多，而台灣史界新的學術步履仍然不夠穩健，但卻代表新一代作手求新、求變的勇氣十足。這一切都虧我們讀者鞭策的力量。

一次的小幅更動卻歷經十年的人事滄桑，即以出版社而論，麥田歷史叢書系列主編從吳莉君小姐的播種，中經幾位先生、小姐的辛苦耕耘到今天，在在見證了本書全面修訂版的不尋常意義。

盧建榮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並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國立台北大學歷史系教授、以及佛光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主要專長是中國古代文化史和當代台灣文化史，著有《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台北：麥田，1999）、《入侵台灣》（台北：麥田，1999）、《台灣後殖民國族認同，1950-2000》（台北：麥田，2003）、《從根爛起：揭穿學閥舊體制操弄教改的陰謀，1990-2002》（台北：前衛，2002）、《鐵面急先

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514～755》（台北：麥田，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450-1050》（台北：麥田，2006），以及《製造敵人：唐代兩京士大夫與河北的他者化，763-868》（排印中）等書及各式論文、文章百餘篇。

作者於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將歐美新史學（即新文化史）引進台灣，除了為文評介此一學風，更有系統地主持譯介工作，使台灣增添數十本西方名著譯作，在使台灣躋身華文世界史學文化工業的領先地位上，功不可沒。此外，作者不僅開學術新風氣，還身體力行，取史學先進國之治學進路，研究中國與台灣的歷史，這使得讀者在閱讀其作品時深感別開生面。

導讀一

十年孤劍滄海盟

如何操作後現代歷史學

盧建榮

一、麥田苗圃終於結實纍纍

後現代的理念於上一世紀中後期流行開來之後，史學相對於相鄰的兩個人文學科，諸如文學和人類學，所受衝擊較小。在台灣，結合後現代理念操作歷史的系統著作應以麥田出版社推出詹京斯《歷史的再思考》為嚆矢。時為一九九六年，距離今天剛好屆滿十年。麥田秉諸回饋讀者的誠意，適時推出改校版的《歷史的再思考》，公司囑我以書系主編立場再寫一篇新的導讀，加上後現代史學的烽火乃是我所引燃，於公於私我都有責任在這裡與讀者見面。

十年前，我在麥田史學園地栽植的一株幼苗，在歷經前後兩任總編，和數位編輯悉心呵護之下，如今已長成一棵枝

繁葉茂的大樹。麥田終成為國內領導史學流行的一個品牌。從不知後現代為何物，到有一本引介概念的入門書，以迄十幾本中，西後現代史學文本在中文世界流佈的開花結果。如今，從事後往前看，才十年光景有如此學術業績，確實是我當初所始料未及。當初只是一股何妨一試的心緒在攪動，結果促使史學界往多元格局邁進，未始不是美事一樁。

飲水思源當感謝有前瞻眼光的前總編輯陳雨航，比較十年前和十年後，局面已判然殊異，更何況我已在十年前點出該文本本身的精髓，以及文本與社會的連動關係，我就不用重複十年前的論述工作。新的導讀的重點就不應放在詹京斯文本本身內容介紹，況且該文本早已不再是引領讀者認識後現代史學的唯一津樑，在後現代史學資訊充斥的今天如何從一個更嶄新的視角去看待重新開張的詹京斯中譯文本，或許別有一番意義。

未來的史家如果要寫一九九六到二〇〇五年這頁台灣史學史，會發現兩個耀眼的果實，即本土化史學和國際化史學。本土化史學業績指的是在「我們是誰？」政治運動思潮帶領之下台灣史文本所涉及的國族論述知識製作，國際化史學業績指的是中文歷史文本隱含要與國際史壇對話的欲求，如此涉及的知識性質雖不可一概而論，但想要提升學術層級的努力是昭然若揭的。

麥田的出版品與上述國際化史學關係較為密切，而這一切又與後現代思潮相關。我就從這裡講起。

二、何謂再現，如何落實到研究上？

英國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一次接受訪問時指出，西方史學先進國的史家大抵在二次大戰後逐漸傾向歷史知識的性質，不再是真相的探求。他這句話要在後現代思潮脈絡去尋思才有意義。無獨有偶，柏克和詹京斯都在一九九二年推出他們生平重要作品，前者是《製作路易十四》，後者是《歷史的再思考》。麥田約在一九九四年同時看上這兩本書，先後買下版權展開中譯本製造工作。於是，就如讀者所知，詹京斯的文本和柏克的文本分別列入叢書的第一號和第三號，中間夾了委由江政寬主譯柏克的《法國年鑑史學革命》的第二號。如今，三號書已有新版推出，一號書新版就是讀者手中的本書。受到後現代影響史家之一的柏克，跟傳統史家分道揚鑣之處在於他接受「再現」的理念。柏克與詹京斯在汲取後現代養分上，表現出來的，前者將再現理念加以實踐，用在他自己文本書寫上，後者則光說不練，大談理念為何。在此，我們讀者要瞭解，在西方，詹京斯扮演的不是後學理念的原創者和先驅者，而是後學理念的詮釋者兼

傳播者，這點與他長期擔任大學教職工作關係密切。在詹京斯文本未推出之前，西方除了後學思想大師輩出之外，帶點後學味道的史學文本也自方興未艾，柏克的《製作路易十四》正是在諸多這種史學文本中的一本。本導讀的工作著重理念如何被實踐，這應該是十年後今天讀者熱切想知道的事，在我史學方法的課上一雙雙熾熱的眼睛告訴我，學生們想知道理念如何被實踐，超過理念為何物多的太多。

一六七二年，法王路易十四御駕親征荷蘭，一六七四年，法王凱旋歸國，一六七八年，法荷兩國在親荷盟邦（即英國和西班牙）見證下簽訂和約。在這件法國入侵荷蘭事件中，在法國官方史料堆裡，各式各樣頌揚路易十四的藝文文本不勝枚舉。在此，柏克為我們展現後現代歷史書寫的特色。他先是說，路易十四的一些化粧師掌握了這次創新拍馬功夫的機會。同時，對於可以細論有關這件事的國王形象描述上，柏克寫道：「我也一樣會掌握這個機會。」（麥田譯本頁95）在此，史家採用一個介入史事的筆法。此外，我要強調的反而是以下兩點：

第一，在展現拍逢功夫的法國官方史料裡，柏克逐一檢視各類視覺材料，諸如油畫、雕像、紀念章、壁雕、方尖碑，以及凱旋門建物等，更旁及路易十四頌揚隊伍所寫的頌詩。無論是視覺材料，還是文獻材料，柏克視之為文本，並

以此駕馭史料解讀工作。接著重點來了，柏克指著一件雕刻作品，說：「以寓言形式再現這個事件。」（麥田譯本頁98）；柏克稱慶典所展示的物品為「再現國王勝利的物品」（麥田譯本頁99）。一六七二到一六七四的確發生了法王率軍入侵荷蘭之事，後人憑以重建過去（傳統史學說辭）、或再現過去（新式史學說辭）的材料，無非是上述那些視覺，以及文獻材料。但儘管材料相同，書寫的方式卻大不相同。依傳統方式，史家較依賴文獻材料超過圖像材料，原因是文獻在表述上有方便徵引之處，而徵引文獻是傳統史家展現證據的唯一法門。對於圖像材料，傳統史家只能望而興歎，當它們不存在了。相反地，新式史家有能力對圖像進行解讀。就像柏克逐件解讀圖像並指出其中的義蘊，然後再將每件圖像的意義用白描工夫予以轉述，從而鋪寫成篇。

第二，柏克並不以此為已足，還進一步指出這個馬屁文化的背後到底有何掩飾之處。柏克再透過荷蘭史料獲知不僅法軍沒有贏，而且還諱敗為勝。原來法軍入侵第十天後，遭荷軍開啟堤閘放水，法王只好敗興而歸，留下部隊繼續作戰，只佔領一個據點後見好就收。而翌年法軍即令再闢戰場，也討不了什麼便宜。以上法王旅荷十天，法軍攻佔某據點，以及法軍另闢第二戰場等三個軍事行動，都被國王的文宣部隊繪聲繪影宣傳成古今罕有的奇功。這時柏克換成一位

傳統史家的嘴臉說：「官方敘述與事實間的差距，是難以掩飾的。」（麥田中譯本頁103），又說：「在官方敘述中，沒有什麼困難是路易無法克服的。」（同上，頁103）請讀者留意，我們與其說柏克於此比較同情荷軍的抵抗，毋寧說他還是相信歷史有事實的成分，只是程度多少罷了。同時，我也必須指出在對後現代理念的求援上，在一九九二年時，詹京斯比起柏克來遠為激烈得多。

柏克告訴我們，材料上所指涉的根本不是原件，卻被理解成是原件。國王所作所為透過他的文宣部隊留給世人兩樣東西：一是國王有其一定的形象，卻被裝點成理想模樣，二是國王真做過某事，卻在遺跡、遺物上留下被七折八扣成讓後人面對的事物。對於上述不是原件的東西，柏克的文本中不是說再現特定形象，就是說再現特定事件。在這部分，柏克展現受後學影響而有的新史學呈現風格。關於特定事件及其相應史料之間的關係，我打個比方，讀者就會明白。那就像人們開會過程本身與事後公布的會議紀錄之間的關係。開會時人們即使再爭吵個夠，後人憑以看到的會議紀錄所呈現的是人人一副理性討論的模樣，其中少有過程的細節，只有結果。至此，試問讀者諸君，憑藉會議紀錄如何重建實際會議進行的原貌？這在新式史家是承認這裡面所牽涉的書寫困境，而老實告訴讀者說，我所寫的開會情況是我根據紀錄所

作再現的東西，跟真正實際開過的會議本身，很可能是兩碼事。新史家如柏克何以在其文本中屢屢出現「再現」字眼，不下四、五十次之多，道理在這裡。多虧麥田出版實踐後學的史著文本，否則我要舉例的話，會多費手腳。這也是我寫第二次導讀改而著重後學理念實踐的理由。理由無他，麥田除了有理念的作品，還有更多實證作品，可供我在寫第二次導讀時，信手拈來到處都是可資援引作為例解的材料。

同樣，本土創作中有關再現的實踐，我可舉拙作《中國中古死亡文化史，450-1050》（台北：麥田，2005）為例來說明。盧作所用史料為出土遺物的墓誌銘。中國人在瀕臨死亡的時刻會做兩個動作：一者親友環視臨死者並與之訣別的「飾終之典」，二者臨死者會宣布口頭遺囑。但墓誌文本中不見得誌誌載有這兩個動作。在墓誌記述項目規格化以來，誌作者在呈現人的一生事情上，臨終場景的捕捉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項目。但許多臨死者即令做過以上兩個動作，不見得都被誌作者載入誌中，而且就算載入誌中，可能有所簡化，甚至有所保留。現在史家在利用墓誌這種死亡敘事文本時，如果要向讀者傳達每位臨死者在面對死亡的態度上，對新式史家如盧建榮而言，他就不會如傳統史家在書寫上採用徵引史料的口氣，他改而說，誌作者再現臨終場景如何如何。

以上不論柏克捕捉路易十四其文宣部隊在形塑國王公共

形象事情上，還是盧建榮呈現墓誌作者記述臨死者面對死亡態度上，都用再現的概念，意思是文本所載離實際發生的過去猶有一間的緣故。這種文本所載與真實的過去有所距離，是傳統史家所輕忽的。

三、何謂集體記憶，如何運用到研究上？

人們所憑以認知過去的是歷史文本，偏偏歷史文本所載與過去之間不能畫上等號，這是新式史家與傳統史家高舉歷史貴在求真旗號的分野所在。在這點上，有的史家在歷史書寫上引用「再現」的概念，已如上述。有的史家則乾脆說人們所認知的歷史世界是一種人類集體記憶的東西，而記憶之於過去則真假相摻。

上一世紀第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幾百萬，予猶太人永難抹滅的創傷。面對這段歷史，美國史家鐸明尼克·拉卡頗（Dominick LaCapra）別有會心，提出以集體記憶的理念來撰述這段歷史，書名叫《奧斯威辛之後的歷史與記憶》（綺色佳：康乃耳大學出版，1998）。他根據四種文本進行一場人類極度創傷經驗的歷史書寫工作，這四種文本是，其一，一九八八年西方學界對於這場屠殺的大辯論，其二，一九五〇年代一本關於劫後餘生者的法文小說，其

三，一部長達九小時的紀錄影片，以及其四，一本美國製作的關於大屠殺的漫畫。透過這四種文本分析，拉卡頗以心理學角度敦促人們進行反思。他說，與其宣洩情緒，毋寧走出事件以獲取心靈的解消。這件屠殺事件的歷史意義端賴人類追思其故，從而走出悲情。歷劫受創的人一腦袋栽入痛苦深淵之中，治療的過程何其漫長。這樣的社會過程，會使得商業性藝文文本多如泉湧，而社會絕大多數人在消費這些藝文文本期間，不管有無意義的療效都在形塑社會的集體記憶。這是社會看待歷史的方式，因此，他說集體記憶才是歷史的本質所在。

在台灣，祖述歷史的論述本質是集體記憶的旗手是王明珂先生。他的貢獻在於中國人兩度於文化邊界的擴張這一課題上。這兩次文化邊界的擴張，分別發生在春秋、戰國時代，以及西漢、東漢時代。而第二次擴張算是達到中國人所能到達的政治的、和經濟地理的極限，與今天中國版圖相比，只差了滿洲人送給中國人的禮物；青康藏高原和蒙古草原。在漢代，漢人對於四裔異族「形象」的建構，決定於與自己經濟生業（是否農耕定居？）和國家形態（是否有單一領袖？）相近度；愈相近的異族，設法令其內地化，諸如朝鮮、越南、滇國、夜郎等，愈不相近的，諸如匈奴和羌人，則儘可能採取武裝鎮壓，把他們定住在華夏文化的邊緣。

漢人生產許多有關這些異族其「異族性」的敘事文本，用來刻畫「邊緣」、來凝聚「中國」。凡是被中國選定有內地化資格的國家，就要這些異族奉獻奇珍異物，用來象徵這些異族與中國之間的差異。這些沒有歷史的民族端賴漢人的紀錄為他們塑像，他們究竟是誰，全是制壓他們的漢人替他們講出來的。

王明珂還講到一個重點，中國境內幾億語言、風俗各異的群落之所以想像他們是一個民族，靠的不是內部文化的一致性，而是扮演「華夏邊緣」那些異族提供給比起中國內部文化的不一致性更大的殊異，此舉讓內部群落自我想像相似性。中國將此華夏邊緣維持住，一旦這樣的邊緣形成之後，中國便軟硬兼施對這些異族予取予求。

漢帝國與四鄰的戰爭，主要發生在對匈奴和對羌人事務上。對匈奴還好，那是一個雙方有底線的戰爭，反正漢人是不可能到草原過遊牧生活的。但羌人與漢人邊界上有著宜農宜牧的地帶，像青海河湟谷地，以及川西北的谷地等，是漢人垂涎的地帶。漢羌之間地理生業空間的爭奪就此如火如荼展開了數百年之久。最後，有許多羌人慘遭屠戮，也有許多移民渭水流域，形成日後西晉帝國的一大隱憂。不過，那些內屬的異族，都教漢人透過歷史書寫教導他們，與漢人是同一祖源，於是就信以為真樂於成為「華夏」的成員。

以上漢人當局及其國家代理人不論是對核心內部（即所謂的「中國」）各群落，還是對被定位在邊緣的異族，他們之間彼此有別的認知完全是集體記憶的結果，在這過程中，有被教以失憶和強調該牢記之處。至於真正發生過什麼事，可能就不是人們所關心的了。

上述不論是拉卡頗處理二十世紀德國人屠殺猶太人的歷史，以及王明珂探討西元前三世紀到西元三世紀漢人與周邊民族文化邊界的確立，都是以集體記憶的理念在解釋人們的歷史認知，與真正發生過的那個過去，實際是遙不可及的兩個東西。但人們透過集體記憶的方式去認知歷史確是千真萬確的事。最後，容我告知讀者王明珂這本力作叫《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1997）。

四、何謂敘述，如何適用到研究上？

敘述本是古代中國史家的看家本領，在那個文史不分的時代，司馬遷的作品是史著，但同時又是千古追模的文學典範，歐陽修是北宋文壇祭酒，但同時寫有《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兩本史著。這都是古代中國敘述史學的著例。上一世紀二〇年代中國新史學運動以來，史家為求新史學的合法地位不惜拋卻祖宗無盡藏的那枝文昌彩筆，使得長期以來現

代中文史著讀之味同嚼蠟。有文采的史家屈指可數，汪榮祖先的本本史著文采嘩嘩，這在現代史學算是異數。這在西方也有相同的困境，唯西方在上一世紀七〇年代經幾位大史家為文作河東獅吼，提倡回復敘述史學起，敘述史學文本開始鋪天蓋地而來。中文世界的絕大多數史家只要一接觸西方敘述史著，難免瞠目結舌不迭。當年力倡敘述史學的西方大師，諸如海登·懷德（Hayden White）、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以及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等三人，其作品的中譯本都由麥田出版，麥田的讀者應該不陌生。

敘述史學是一種藉用文學表現文化來從事歷史書寫的一種方式。海登·懷德特別指出西方十九世紀的大史家其作品隱涵文學表現文化，亦即史學敘事文本中不乏修辭學的講究和情節的編織，根本與文士操筆弄文沒有兩樣。每本史書都有一種修辭學調性，至於是悲劇、喜劇、諷刺劇，全隨史家決定之。

一七九九年，法國革命曆法的霧月十八日，拿破崙·波拿巴發動政變推翻政府，最後從首席執政成為皇帝。五十二年後這位政治野心家的姪兒路易·波拿巴師法當年乃叔故伎，就在一八五一年亦選霧月十八日發動政變推翻共和國體，讓自己變成皇帝。對於這種攬奪一八四八年民主革命果

實的行徑，有位學者悲不自勝，寫了篇〈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抨擊沐猴而冠的這位法國皇帝。這位學者不是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馬克斯。讀者諸君請留意，一七九九年霧月十八日對於一八五一年的路易·波拿巴和馬克斯而言，是歷史典故。路易賴此典故搞政治，文士如馬克斯用此典故譏諷政客之不是。馬克斯的文題只要是西方略通文墨的人皆知此典故，而且是深知其中有著政治鬧劇的修辭學意涵。這篇文章從訂定題目就預示了此文終將不朽。再加上內容有著社會史創意的石破天驚之舉，無怪乎一百五十多年過去了，仍不乏讀者在諷誦該文。這原是一篇政論文章，但因深度夠，歷史的豐富性強，反而變成一篇歷史敘事文本的絕妙好辭。

講到這裡，我要請出海登·懷德為我們講解。他認為愈是具有諷喻性的歷史文本，愈能對大眾形塑有效的歷史認知。馬克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在懷德看來，不無充滿修辭學和情節編織的質素，透過一七九九年這個歷史典故的取用（不管是路易·波拿巴還是懷德），愈是有左派想法的知識階層人士愈能一眼看出這是在指涉一位小丑型政客攬奪了革命的果實。光題目就達到震懾政治右派的效果，就不用說內容的批判性力道，以及力透紙背的歷史洞見了。馬克斯此文在西方知識界盛傳已久，懷德以此文本來

講解他獨門的歷史意識，允為精到的譬解。但對台灣讀者容或有陌生之處，故爾我略作說明如上。

盧建榮於二〇〇四年推出的《鐵面急先鋒》（台北：麥田），是一部歷史敘事文本。通篇在解釋從五一四到七五五年何以會出現一批以徐有功為代表的爭取司法獨立隊伍。作者先從六九三年徐有功因辦案遭政治迫害事件講起，作為這段二百四十餘年歷史的切入點，再以回溯筆法追述宗教信仰與司法專業的關係，一路往上追到國家成文法典的頒布所牽涉的法律知識的製作，最後更追索到五一四年以來的司法組織架構的大調整無意間帶給公正法官創造司法獨立的絕佳機會。在這漫長的追蹤歷史過程，中間又穿插了六九三年到七五五年的歷史發展。這是一個時序顛倒、錯亂的敘事文本，倒敘、插敘的筆法散見全書各處，一反傳統史家直線史觀的呆板操作方式。

馬克斯在寫一八五一年法國路易·波拿巴竊國、並變更國體事件，跟盧建榮在寫五一四到七五五年一群法官力抗強權的現象，卻是分別屬於海登·懷德所說的笑鬧劇和悲劇這兩種戲碼。高明的笑鬧劇可使讀者裂嘴大笑之餘，流出眼淚。悲劇於讀者的感染力可使他們讀出史書的寓意，這些都是敘述史學的迷人之處。

在這裡，麥田提供許多敘事文本供讀者取讀，它們計有

琳·杭特（Lynn Hunt）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雷蒙·瓊納斯（Raymond Jonas）的《法蘭西與聖心崇拜》、彼得·柏克的《製作路易十四》和《知識社會史》，以及多本霍布斯邦所寫的書。立緒出版社出版好幾本彼得·蓋伊（Peter Gay）的書，也都是歷史敘事文本的名篇。從這些作品，讀者見識到史家講故事不凡的功力。

五、如何在傳統史家英雄無用武之地大展身手？

傳統史家的慣技是處理國家主題的大歷史，多在政治菁英和文化菁英處深所著墨，此所以政治史、軍事史，以及思想史和藝術史在過去大行其道的原由。新式史家則著力於社會部門，先是關心人類的集體行動，表現出的就是經濟史和社會史，這是上一世紀六〇、七〇年代世界史壇的重頭戲。新式史家於上一世紀八〇年代繼而關心人類集體行動背後的文化邏輯，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的文化作為。此新文化史所以勃興的緣故。新文化史是回應後現代史學理念的主力所在。如果詹京斯於《歷史的再思考》所立下的矩矱，是後現代史學的極致，則新文化史家所作的只不過是達到此一矩矱的些微部分。詹京斯的追隨者組織一個叫「歷史的再思考」的社群，這群史家光說不練，就像詹京斯一樣，鎮日價只談

理論不作實證研究；而詹京斯於其二〇〇三年新作則愈走愈趨極端，情形有如人類學中有一派思潮專思人類終究無法瞭解異民族和異文化，只差點沒讓人類學走入窮途沒路。

受到後現代理念的刺激而有所反省的新文化史家在技術層面上，一方面進一步擴大史料的利用，另一方面對於依賴甚深的檔案材料找到它的極限處以避免過度使用、甚至濫用。

在進一步擴大史料的利用這一方面，新文化史家開發出遺跡材料和文學材料這兩種史料。先講遺跡材料。本來史家只擅長利用白紙黑字的文獻材料，而且這類文獻材料多半是記載性質的敘事文本。譬如，漢武帝天漢二年（西元前九九年），李陵出擊匈奴因寡不敵眾投降。這一軍事失利行動分載於《史記》和《漢書》這兩本史書中。現代史家不論在研究漢匈關係，或是漢匈軍事史，抑或是延伸出去作此一事件的餘波，諸如司馬遷因替李陵說話而遭刑，李陵會見漢使蘇武，以及日後有人偽託李陵的子孫等等，都是傳統史家意識到的問題。還有，這些問題在時序上前後清晰可觀，方便史家編織因果情節從而製作出史著。

在歷史過程中，許多人的作為不見得被史家意識到而載入史冊，對於當時的人沒有意識到的事物，比起引人注目而入史的事物，兩者之間的多少直如大海和從中汲取的一瓢水

的差別。新史家對於人自己做過的事卻沒有意識到，或是人盡皆知被認為不足入史的常識，卻情有獨鍾，而用力發掘；這類事物比起與國家主題有關的大事來，只是小歷史（histories），而且都是出於古代沒有入史資格的小人物（包括婦女和下階層各種邊緣群體）所為。

美國史家雷蒙·瓊納斯對於崛起於十七世紀末一個法國地方小教派——聖心教派——在此後二百年竟然捲動全國政治，深表關注，於二〇〇〇年出版一本書叫《法蘭西與聖心崇拜》（麥田於2003年出中譯本）。瓊納斯於書中使用了不少遺跡材料，如巴黎聖心大教堂，具有通靈能力的地方聖者遺骸及其所在的教堂或修道院；也使用不少遺物材料，如與耶穌心臟有關的各種圖像飾物和標記，再如為了建造聖心教派的全國總壇動員全國勸募的小額捐款認捐卡，還有其他各種圖像等。瓊納斯收集到這類遺跡物事，第一個反應就是返原到原來物事所在的脈絡裡去，從中探究與這類物事有關的人類集體行動及其背後的心靈結構。

其實，類似瓊納斯的研究策略早在一九九五年盧建榮於發表〈五至六世紀北朝鄉民社會意識〉一文，就著了先鞭。盧氏是在探討全國各地社區宗教活動中緣何會發展出為國家祈福的行動，為何百姓日常生活中會去關切國家這類離他們至為遙遠的物事。盧氏所用的材料就是社區教民捐錢打造石